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对比研究

王艳萍,余卫华^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本研究以 Byram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为理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问卷信度系数为 0.803),对来自具有不同跨文化交际环境的两个地区共 193 名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平均水平比较低;(2)跨文化交际能力四维度发展不均衡,知识维度落后于其他三个维度;(3)不同环境下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表现出趋同的特征,跨文化环境对其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 大学非英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环境;维度;影响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3-0103-04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英语作为世界共通语越来越凸显其在世界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英语已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某些民族或个人所独有,除了在英语母语者内部使用外,英语更多地出现在英语本族人与非英语母语者之间甚至非英语母语者之间的交流中。^[1] 频繁的跨文化交流无疑已成为本世纪最显著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在跨文化交流中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由于文化的差异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也越来越多。^[2] 这意味着当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不能单纯以英语学习者掌握英语语言或英语国家文化知识为目的,发展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简称为 ICC)应当成为当前英语教学的新目标和关注点。

许多研究者已经从理论上就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研究,尤其在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界定和如何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提出了很多见解,^[3] 而对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证研究涉及较少,特别是对于跨文化交际环境对英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研究目前尚处于空白状态。一般认为,环境因素在能力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4] 那么跨文化交际环境对当前我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能产生多大影响,及其潜在的原因等方面肯定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本研究针对处在不同跨文化环境的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对比研究,一方面希望通过该研究来了解当前我国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水平,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比较来探索跨文化交际环境对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从而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提供初步的心理科学依据。

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所指的“跨文化交际环境”(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ntext, 简称“环境”)它不同于语言学中的语境,而是特指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与外国人接触并用英语交流(尤指社会层面上的接触和交流)的频率或潜在可能性。

一 理论基础

本研究主要以英国学者 Byram 建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为理论基础。这一模式适合英语作为世界共通语这样一种特殊的语言教学背景,结合了跨文化和外语教育两方面视角,以交流者为主体,强调交流过程中的动态性和互动性。Byram 认为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应包括以下四个维度:^[5] 1、“态度”,态度表现在自我相对化和对他人的评价上,主要指对待那些文化意义,信仰及行为方面的差异的态度。2、“知识”,知识是指对本国文化和社会群体以及对交流对方相应方面文化的了解,还包括对个人和社会层面上的交流互动过程的认识。3、“技能”,技能则是指个体利用已有的信息和一般的知识框架对外来事物和文献进行理解并发现其内涵的能力。4、“批判性文化意识”(以下简称意识),该意识是指一种批判性、基于明确标准之上的鉴别、评价本民族文化及其他国家的文化惯例和文化产物的能力,也包括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明确的标准进行互动、调停和磋商的能力。Byram 指出批判性的文化意识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的中心,知识和态度是成功交流的先决条件,成功的交流同时还取决于在交流过程中所利用的技能。

二 研究方法

[收稿日期] 2008-03-06

[作者简介] 王艳萍(1975-),女,湖南邵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①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一)问题

基于以上理论阐述和研究目的,笔者提出两个问题:(1)在不同跨文化环境下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怎样?(2)跨文化交际环境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否产生影响?

(二)被试的选取

为使研究结论真实反映客观实际,本研究在被试的选取上既要保证被试所处大学的跨文化交际环境有较大的差异,又要尽量排除无关因素的影响,诸如英语教学水平、师资力量、生源质量、英语教材等。为此,本研究选择了广东和广西两所较为持平的大学的本科非外语专业二、三年级学生为被试。有效被试总人数为 193 人,根据其来源被试分为两组:广西组 107 人,广东组 86 人。

(三)研究工具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本研究自编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问卷^[6](信度系数 R 为 0.803),问卷由三部分组成:(1)个人信息部分。该部分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给出的 14 个问题做出选择或填空,旨在收集被试的一些个人基本情况以及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相关的个人信息。(2)跨文化能力部分。该部分是整个问卷的核心,主要依据 Byram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参照 Fantini 的跨文化能力问卷的形式(A YOGA Form)^[7]设计而成,用于跨文化交际能力自评。要求被试根据每个问题,从“0”到“5”中选择一个数字为自己的实际情况打分。该部分共包括四个维度(批判性文化意识、态度、技能和知识),每个维度由 10 个问题组成,共 40 题。每个问题赋值 2.5 分,该部分的总分为 100 分。(3)跨文化交际案例部分。该部分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部分的有效补充,由 10 个案例组成,每个案例赋值 4 分,总分为 40 分。被试根据案例内容作出分析和判断。案例主要来源于中国人和欧美人的实际交往案例、跨文化交际专著、以及在英语课堂中收集的素材。所有案例在西方文化中的代表性得到了多名英、美籍外教的确认。

(四)评分标准

跨文化能力部分:被试从“0”到“5”中选择一个数字代表自己目前的实际情况,选 5 得 2.5 分,选 4 得 2.0 分,依次类推,每个级别相差 0.5 分。

案例分析部分:被试就跨文化案例选择一个答案表明自己的态度,选择非常同意得 0 分,比较同意得 1 分,中立得 2 分,不太同意得 3 分,完全不同意得 4 分。

(五)数据收集过程

数据收集采用集体测试,在实验中由主试向被试出示统一的指导语,要求被试完成问卷中的所有问题,采取不记名的形式,时限为 20 分钟。

(六)数据管理与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12.0 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

三 结果与分析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总体描述性统计

被试总体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平均分和标准差见表 1。从该表可以看出,被试的平均得分比较低,表明从总体来说

当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比较低。

表 1 跨文化交际能力总体描述性统计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最高分	最低分
193	67.46	9.14	92	29

(二)组间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描述性统计及比较

不同组别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平均分、标准差情况见表 2。其中广西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平均得分为 67.41,广东组为 67.53,两组平均得分均比较低,差值仅为 0.12。随后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双尾)结果显示 t 值为 -0.093 , $P = 0.93$ 大于 0.05,说明组间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平均得分无显著性差异,即跨文化交际环境并没有对该两地被试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平均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表 2 组间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描述性统计及 T 检验

组别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t	P
广西	107	67.41	9.14	-0.093	0.93
广东	86	67.53	9.14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及组间比较

不同组别跨文化交际能力各维度的平均分、标准差、 t 值和 p 值情况见表 3。由该表可以看出:(1)广西组在批判性文化意识维度上得分最高,广东组在态度维度上得分最高,而两组在知识维度上的得分均为最低。(2)组间比较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各维度平均得分除在批判性文化意识上 p 值小于 0.05 水平($P = 0.018$),其他三项均无显著性差异($P > 0.05$)。说明除了在批判性文化意识方面组间可能存在某些差异外,其他三个维度的组间差异并没有统计意义。

表 3 组间四维度得分描述性统计及 T 检验

维度	组别	平均分	标准差	t 值	P 值
意识	广西	18.06	2.93	2.38	0.018
	广东	17.03	3.03		
态度	广西	17.96	3.17	-0.95	0.343
	广东	18.38	2.85		
技能	广西	17.56	2.76	0.34	0.732
	广东	17.43	2.38		
知识	广西	13.71	3.36	1.89	0.061
	广东	14.63	3.34		

(四)组内各维度间的比较

两组组内跨文化交际能力四维度间平均得分比较 Scheffe 事后检验结果分别见表 4 和表 5。由表 4 可知:广西组内知识与意识、态度、技能之间差异显著,而其他维度间差异均不显著;由表 5 可知:广东组知识与意识、态度、技能之间差异显著,此外,意识与态度之间差异较为显著($P = 0$ 。

029,0.05),而其他维度间差异均不显著。该比较结果表明两组被试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在结构呈现基本一致的趋势。

表4 广西组内维度间均值比较 Scheffe 事后检验结果

维度	意识	态度	技能	知识
意识				*
态度				*
技能				*
知识	*	*	*	

*表示 P<0.05,下同。

表5 广东组内维度间均值比较 Sheffe 事后检验结果

维度	意识	态度	技能	知识
意识		*		*
态度	*			*
技能				*
知识	*	*	*	

(二)组间跨文化交际案例的描述性统计及比较

两组跨文化交际案例平均得分、标准差等详见表6。被试的跨文化交际案例成绩中,广西组为28.29,广东组为28.09,两组的成绩均比较低;随后进行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t值为0.25,P值为0.80,说明广东、广西两组学生在跨文化案例分析中所得的平均成绩没有显著性差异,该结果进一步辅助说明了跨文化交际环境对被试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6 组间跨文化交际案例的描述性统计及T检验结果

组别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t	P
广西	107	28.29	5.69	0.25	0.80
广东	86	28.09	5.86		

四 讨论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和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两组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都比较低,且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表明从整体水平上说跨文化交际环境并没有对被试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产生显著影响。针对该结果笔者试图从问卷的第一部分所得数据来探讨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首先,在被试与外国人的接触频率上看,两地的情况颇为相似,绝大部分学生很少参与跨文化交际实践(广西组73.8%,广东组58.8%),甚至还有部分学生从未有过此类的经历(广西组17.8%,广东组23.4%)。而事实上,只有通过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实际接触和交流才是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最佳途径。Kim甚至还指出只有通过长期处于某种不同文化之中或者参与该文化的社会活动才能在交流过程中达到自如和精通的水平。^[8]其次,在英语学习的目的问题上,根据被试的选择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

会,通过CET4或CET6并获得大学本科文凭(该三项选择人数均超过75%),而用于跨文化交流(组一27.1%,组二32.6%)和英语文献阅读两项却排在倒数二、三的位置。这些数据说明目前大部分非外语专业大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不是进行交流,而是那些和他们的近期利益紧密相关的东西,因此他们一般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交际活动。再者,以往非外语专业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没有把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这种残存的影响也可能导致教师和学生大学英语学习的目的认识不够全面,有些仍停留在语言、文化知识的学习和语言能力的培养的层面。最后,笔者认为学生对口语水平的自我概念也可能阻碍他们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心理因素,但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尽管处在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环境中,这些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还是表现了趋同的特征。

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不同跨文化环境下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内部四维度水平均比较低且呈现不均衡的趋势。四维度中两组得分最低的为知识维度,这一结果表明被试对跨文化交际及西方文化等方面知识不足,而且大部分被试尚不完全具备利用已有的信息和一般的知识框架对不同文化或文化差异进行理解并发现其内涵的能力,尚不够具备批判性的、基于明确标准之上的鉴别和评价本民族文化、其他国家的文化惯例及文化产物的能力,因而难以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明确的标准进行互动、调停和磋商。由于跨文化技能和批判性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主要依赖于有关自我和他人文化方面的知识,个体需要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敏感的态度来发挥自己的发现和解释技能,而跨文化交际及文化方面知识的欠缺影响了技能和意识水平及其对跨文化交际和文化差异的态度。根据问卷第一部分的调查,尽管在英语教材和课堂教学内容中涉及到文化的内容,但是被试所在学校并未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文化学、跨文化交际、西方文化和英语国家概况等相关课程,这可能是导致被试在知识维度得分低的原因。当然值得肯定的是其他三个维度的平均分相对知识维度而言是有一定差异的。说明大部分被试在自我相对化和对他人的评价上,对待那些文化意义、信仰及行为方面的差异的态度还是相对较为客观、中肯和开明;也能基于一定的标准较为有意识地以平等身份接触不同文化,较为积极地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跨文化环境中的一些想当然的现象。

五 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获得如下结论:

(一)目前非英语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平均水平还比较低。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四维度发展不均衡。就各维度的得分而言,知识维度落后于其他三个维度并与其他三个维度之间差异显著。

(三)从总体来说,跨文化环境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影响不大,不同跨文化环境下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总体水平间无显著性差异。

[参考文献]

- [1] 肖龙福. 拆解文化围墙的“指挥棒”——浅析外语教学大纲中的文化教学目的[J]. 外语教学, 2002, (2): 81.
- [2] House, J. English as lingua franca: a threat to multilingualism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Blackwell, 2003, (4): 556 – 578.
- [3] 蒋 莉. 关于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度的调查[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 [4] 彭聃龄. 普通心理学(修订版)[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5] 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M].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31 – 38.
- [6] 王艳萍. 大学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地区对比研究[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7] Fantini, A. E. A Central Concern: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P]. Blackwell. Adapted in part from a “Report by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ask Force,” World Learning, Brattleboro, VT, USA, 1994. Alvino E. Fantini, Brattleboro, VT, USA 1995; Revised 2000.
- [8] Kim, Y. Y. 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 – cultural Adaptation [J].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1.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Non – English – major Students in Different Contexts

WANG Yan – p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Byram’s ICC mode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193 non – English – major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wo districts of different intercultural contexts with the research instrument of a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demonstrate that: First, the current ICC levels of the non – English majors in these two contexts are quite low; Second, the status of four dimensions in ICC is of imbalance; Third, on the whole, the contex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ay exert little influence on their ICC development.

Key words: non – English major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context; dimension; influence

(上接第 60 页)

- [15] 宋金寿.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5. 117 – 118.
- [16] 王永祥. 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255.
- [17]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2.
- [21]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57.

Mao Zedong’s Concept of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ZHOU Ning – ning

(The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College of XiangTan, XiangTan 411102,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concept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originated mainly from the exposition of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on democracy with Modern thought of Modern China as the background. It is the condens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Mao Zedong’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rich in content. It clearly defines the main body of democracy is the people proposes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material and system guarantee of democracy.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the main body of democracy; modernity